

国内

领导领导,叫你什么好?

官场“称呼学”:逢长必叫 叫大不叫小

某个晚上,一名中年男人叩开了郭振华家的门。“有个姓池的人找你。”女主人高声招呼郭振华。“是池、池厅长?”郭问。“哎呀呀,池厅长您、您来看我们?”意识到来者的身份后,女主人恭敬地赔笑道。

这是官场小说《沧浪之水》的一个桥段,刻画的正是官场中人对“称呼”的娴熟运用。

2001年,痛恨官场中丑恶风气的阎真写下了这本小说。

“一个科长一个小主任,官位叫出来他就高兴一点。”阎真告诉记者。

类似阎真这样的体会,某县财政局的小丁也有。不久前她参加一次接待活动,直到见到《××调研组来县接待手册》,小丁才知道,她一直称为“王处”的这位省财政厅领导,原来只是一个主任科员。



“逢长必叫,叫大不叫小”

对于基层的许多官员来说,“逢长必叫,叫大不叫小”是相互称呼时的惯例。阎真说:“在县里,一个科级干部就很大了。一个局长其实是科级,但是我要叫他局长。股长比科长还要小,可在县里也已经好了,也是一个长嘛,也要叫出来。”

“叫大不叫小”的惯例不仅仅是基层的专利。一位资深媒体人对记者介绍:“在一些部委,如果党组书记和部长不是同一个人,有时下属们也会叫党组书记‘部长’。正部级机构的领导叫主任或者局长的,他们的下属会习惯于叫部长。”这不是为了追求虚荣,而是害怕与低级别的职务混淆。“部长级别高,而办公厅主任也是主任。”

除去上述最基本的称呼规则外,官员之间的称呼还有许多微妙之处。

“上级对下级常常以‘姓名+同志’相称,但下级对上级当面一般却只用‘姓+职务’或‘职务’。”华东师范大学的胡范铸教授在他2000年发表的论

文中指出。他的研究方向是应用语言学。

然而,有些时候这条规律并不适用。例如,一个机关的正副书记中有好几位姓王时,“叫某某书记是惯例,”上述媒体人说,名字+职务的选择很多时候“就是为了有一个很明确的区分”。

区分不同称呼的,除了职务外,还有资历与感情。一般来讲,官员之间互称官衔是较为客套和安全的,但一些职务不高的“老机关”却常享有“豁免权”,可以将别人眼中的“王书记”省去姓氏,直呼其名。上述媒体人说:“在机关里称名字,本身并不是冒犯,当然你要估量一下自己的地位,以及你和那个人到底有多熟。”

在官员中间,流行着种种特殊情况下的称呼办法。例如,对于姓付的书记,往往不能称付书记,而要用名字称“××书记”;当两个书记同姓时,也要叫名+书记……熟练掌握着一套规则,几乎是公务员的入门程序。

“老大”与“老板”

除了大庭广众下的繁多称呼,一些官员在酒酣耳热、窃窃私语时的叫法也各不相同。

一位媒体人曾在县乡一级基层政府的饭局上见识过,一名干部起身敬酒,朗声说道“我们老大……”当面叫一声“老大”,除了几分亲昵,更展现出明确的权力排序。与之相对的,所谓“老二”不仅不用做面称,甚至不能公开排出来。

“一个省里面省委书记是老大,但是你不能说省长是二把手,因为在政府口,他也是老大;你也不能说副书记就是二把手,因为按照惯例,在党内,兼省长的书记(才)是。”这位媒体人说。

然而到了市级干部,这种

江湖气的“老大”、“老二”便有时被透着商业气息的“老板”所取代。

一位官员告诉记者:称“老大”在基层会比较多,更江湖气一些。一般称“老板”的,至少是市长、市委书记这个级别的。如果称一个县委书记为“老板”,会显得特别可笑,因为县委书记就是个处级官员,所以往往会称“老大”;如果称呼一个乡长“老板”也不行,因为级别同样不够。

真正难以处理的是如何称呼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降职的官员。江苏省级机关一位工作人员,曾经在南京的颐和路上遇到过当年的无锡市长毛小平,这位工作人员竟然一

时语塞不知如何称呼。“喊他毛市长、毛主任都不合适,喊小平吧,你不觉得‘小平’是特指的吗?所以后来我只好说‘哎——哎——你好’。”2012年毛因为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,他一度被认为在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担任副主任,后又传出降为处长。

江苏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现在县里也常常称省城去的领导为“首长”,不分级别。“之前,只有中央来视察的领导,不方便提前透露姓名或者不适合直呼其名的,我们才在制作席卡和称呼时称‘首长’。当面这样称呼时,级别差距至少要有3级。但现在,称‘首长’已经没有那么严格了。”

改革开放前“同志”独步天下

在胡范铸教授看来,“称呼学”的流行和称呼的变化,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社会风气“变坏”了,更反映着社会心理的变化。

改革开放前独步天下的“同志”,起初是有着共同理想与信仰的政党成员之间的共勉。孙中山在1918年发表《告海内外同志书》和《致南洋同志书》,其遗嘱常被总结为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须努力”。

1921年,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正式写道:“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……都可以接收为党员,成为我们的同志。”这时的“同志”,还只在社会精英间流行。

1949年后,“同志”迅速成为正确甚至唯一正确的政治称呼。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要求互称同志。1965年12月14日,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》,要求“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,一律互称同志”。

然而在社会秩序混乱的“文革”时期,即使同志这个称呼也显得不合时宜。胡范铸说:“那时同志都不能随便叫,叫什么都觉得不对,说错了就会闯祸。”

今天的人已很难想象“同志”之称所引起的重视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曾经明确,“党

内一律互称同志,不要叫官衔;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,不要叫‘指示’”。

1984年,“同志”有一次不同寻常的亮相。当时的《武汉晚报》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:“小平同志:我这样的称呼,似乎不太礼貌,若有不妥之处,请给予责备。”这是1984年4月武汉一职工向邓小平写的申冤信。邓小平在信上圈阅道,“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,我很喜欢,酌重处理!”

时间进入21世纪,“同志”有了更丰富的含义,使用起来也显得很突兀。

现在见面还称“同志”显得怪异

2003年,全国各地党委都曾专门制定、下发《关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内互称同志优良传统的通知》,要求“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同志,不称职务”。

例如,甘肃省的文件就要求,“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为同志,党内刊物、文件和其他书面材料也要按此办理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,带头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,做党内互称同志的表率。各级党组织要制定完善相应的制度,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,形成党内互称同志的有效机制……”

但种种迹象表明,重视并未使互称同志重回流行。

2013年10月,《人民日报》转载了题为《党内称谓容不得江湖气》的评论,说“不知从何时起,互称‘同志’的人越来越少,甚至一些脱胎于江湖绿林,裹挟着浓厚封建陋习的‘老板’、‘总管’、‘大哥’等庸俗化的称呼,在某些部门或单位已渗透到党内。”

一些地方为了规范称呼,甚至“制作党内互称同志提示牌,摆放在党委(支部)会议室、党员活动室等场所醒目位置”,以“营造民主平等、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,形成畅所欲言、集思广益的工作作风”。

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永刚教授说,现在“同志”作为一种社会主义传统保留下来,成为正式场合的庄重称呼。但

在现实官场中,在对称呼进行“推敲”后,官员私下里往往不会互称同志。在一位官员看来,现在如果见面还称“同志”,不仅显得怪异,还意味着拒人于千里之外,“下面的事都无法进行了”。

尽管存在着所谓的称呼规则,但因地域、风俗及人情的巨大差别,官场称呼并无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。例如在湖南,一些称呼就很独特,官员们背后往往称呼高级官员为“张嗲”、“李嗲”(“嗲”在长沙话中意为老老),同僚之间则会互称“张哥”、“李哥”。

现在在一些地方,某些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的称呼如某局、某厅等,很流行。

千万别直称“某巡视员”

巡视员一般都是厅级干部,算大领导了,但在现实中,却很少有人直接称他们为某某巡视员。“千万别这样喊,人家不乐意听。更多时候,我们都还是会用他之前的职务来称呼,比如王局、张厅、李主任等。”多名省级机关干部对记者说,“但是正式行文时,要称为巡视员。”

另外,一个城市有一个市长,若干个副市长。向客人介绍时,过去不论正副只说苏市长李市长,客人不甚明白到底是正的还是副的,于是,为了便于区分,说着方便,就把市长叫大市长,把常务副市长叫二市长。依此类推,可以叫出大县长、二县长;大书记、二书记之类。据《南方周末》